

转型期中国社会研究丛书

主编 唐力行

读史偶得：

关于转型期中国社会的若干思考

唐力行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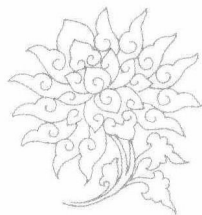
转型期中国社会研究丛书

主编 唐力行

读史偶得：

关于转型期中国社会的若干思考

唐力行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读史偶得:关于转型期中国社会的若干思考/唐力行著.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转型期中国社会研究丛书/唐力行主编)
ISBN 978-7-208-10089-3

I. ①读… II. ①唐… III. ①社会发展—研究—中国
IV. ①D66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35098 号

责任编辑 曹勇庆

封面设计 王小阳

· 转型期中国社会研究丛书 ·

唐力行 主编

读史偶得:关于转型期中国社会的若干思考

唐力行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35×965 1/16 印张 19.75 插页 4 字数 233,000

2011 年 8 月第 1 版 201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10089-3/K·1787

定价 42.00 元

总 序

唐力行

上海师范大学历史学科半个多世纪来,经过几代学者的共同努力,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形成了求实、创新的学风,扬长避短,开辟了一些颇有特色的研究领域。目前已建立历史学一级学科博士点和博士后流动站。

中国近现代史学科是上海师大历史学科中最具特色、最充满活力的二级学科之一。1982年,中国近现代史学科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1994年成立了中国近代社会研究所。2000年中国近现代史博士点经国务院学位办批准设立,2001年在中国近代社会研究所的基础上建立了中国近代社会研究中心,并于同年被评为上海市教委重点学科。2005年升格为上海市重点学科(第二期)。目前,我们正在同时建设上海市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和上海市重点学科(第三期)。区域社会经济研究、社会问题与社会变迁、下层社会和帮会研究是研究中心的主要研究方向。同仁以转型期中国社会研究为中心,形成了以下四个特点:整体中国与区域社会研究相结合;长时段与短时段相结合;上层社会与下层社会研究相结合;注意史学理论与方法论的创新。

为加强国内外史学界的学术交流,我们在上海市教委和上海人民出版社的鼎力支持下,由上海市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编号 SJ0703)、上海市重点学科第三期(编号 S30404)资助,出版《转型期中国社会研究丛书》,陆续推出同仁之研究成果。希望我们的成果能为史学园地添加几分春色。

2010年5月8日

自序

我自 1963 年进入南京大学读史以来,已有近半个世纪了。真正开始以治史为生,则是“文革”以后的事了。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后的 20 世纪 80 年代,是思想开始解放的新启蒙时代。人们开始反思那些不容置疑的“规律”,质疑涂上神圣光环的“真理”。在思想解放的大潮下,史学界生机勃勃,百花齐放。本着“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讨论了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历史发展的动力等共同关心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实质就是:“文革”究竟是偶然的,还是有其必然性?阶级斗争是不是历史发展的唯一动力?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场大讨论是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的历史学五朵金花,尤其是关于资本主义萌芽和农民战争讨论的延续,不过已不是在同一层面上了。一门成熟的科学应该有自己的理论,历史学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的基石,当然应该有自己的理论和方法。历史学需要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指导,但历史唯物主义不能代替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伴随着讨论的深入,历史研究出现了三个重大的突破:其一是由单一的政治史研究转向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科技史、地理史等多方位的研究。其二是由孤立的封闭的研究转向综合的、开放的、跨学科的研究。其三是在史学认识论和方法论上开始包容一些重要的西方史学理论与方法论。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在从事徽州区域社会实证研究的同时,开始思考传统中国向近代转型的一些理论问题。我觉得治史者应该有自己的对历史变迁的一个整体的思考,所谓“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没

有这样一个平台，实证研究是难以深入和升华的。反之，实证研究也会促进或验证这种整体的思考。80年代开始，我在阅读西方史学理论的同时，重新研读了马克思的原典著作。我发现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我们过多地寻找发展的阶段性，却很少注意历史的延续性；我们过多地强调革命突变，却完全抹杀了改良渐进的意义；我们过多地夸大社会形态演化的普世性，却忽视历史发展的特殊性；我们过多地关注政治和精英，却看不到普通民众和社会生活，如此等等。阅读思考的过程中我撰写了一系列的论文，在当时的大讨论中做出了自己的答案。今天看来这些答案是稚嫩的，但是他们记录了那个时代我们的思索，也可以读出当时的我，所以不作修改照原本录上。

本集所收文章大体可以分为四个方面。

一是关于中国社会转型的理论思考，共6篇，大多写于20世纪80年代。其中最有特色的是用剩余劳动的理论来重新审视中国前资本主义社会及其近代转型的艰难性。例如《试论中国封建社会的剩余劳动——兼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一文，以研究中国封建社会的剩余劳动为基本出发点，探求中国封建生产方式所独有的经济规律。与西欧封建社会以劳役地租为主不同，中国封建社会是以产品地租为主的，在产品地租形态上农民有可能保留一部分剩余劳动。在地主制结构中封建皇权、地主和农民三者经济利益的交叉矛盾，是造成产品地租形态上剩余劳动周期性振荡这一特定的经济规律的内在原因。各个王朝之间的差异只是周期性振荡频率和振幅不同而已。由此造成社会经济的周期性破坏和恢复，恢复后的经济也仅仅达到或略高于前一朝代，剩余劳动的社会积聚（表现为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始终未能达到足以突破封建自然经济的地步。在产品地租形态充分发展的情况下，商品市场难以发展，资本主义萌芽难以生长。对中国封建社会长期性的探讨告诉我们：历史科学的研究只有同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密切结合起来，才能从纷繁复杂的历史事件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来，才能科学地、

合理地理解各种历史现象。《从系统论的角度重新探讨几个理论问题》一文认为,认识论与方法论是紧密相关的,要在认识论上有所更新,首先必须在方法论上有所突破。由于我们在讨论中习惯于把每个理论问题限制在它所在的特定范畴内,孤立地、平面地、直线地加以考察,因此难以求得令人信服的结论。如果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哲学称之为一个大系统的话,那么它的理论层次便分别构成四个子系统。剩余劳动与各个层次的交叉点,也就是各子系统的核心层次。从这一研究框架出发,本文依次对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在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活动中,如何看待剥削阶级代表人物的作用;人类社会形态的发展究竟是单线的还是多线的;如何评价历史上各种意识形态(例如儒家、道家、法家等)的社会功能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论徽州海商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与《论明清资本主义萌芽缓慢发展的原因》两文着力于探讨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难以成长的原因。通过中国与欧洲中世纪向近代转型过程的比较,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封建生产方式具有的内部的坚固性和结构”,它对“商业的解体作用”,造成了极大的“障碍”。这种经济结构,对于商品经济来说,犹如一块贫瘠的土地。同时,封建政治权力也阻碍着“商业的解体作用”。中国的重农抑商,英、法等国的重商主义,两种不同的政策,造成两种不同的后果。马克思说过商人“是这个世界发生变革的起点”,而在中国是否也是如此?商人在转型过程中的作用应该如何来评价?“海商”一文对明代嘉、隆年间被诬为“倭寇海盗”的徽州海商进行了研究。认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生长并非完全是自然历史进程的产物。16世纪世界市场的开拓和走私贸易的隆兴,给予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滋生以一个关键的契机。“倭寇海盗”武装反明斗争的意义超越于农民战争。“倭寇海盗”反海禁斗争是市民反矿监税使斗争的先声。“倭寇”之争留给我们的启示是,历史学家首先必须有忠实于历史的勇气;其次,必须要有敏锐的洞察力,紧紧把握住历史发展的总趋势,勿以帝王之好恶为好恶,坚持以是否有利于历史的进步

作为评判历史事件或人物的客观标准。只有这样，史学才谈得上科学性，才会有不衰的生命力。《清季社会经济改革刍议》对清季社会转型之艰难作一纵横观察。纵，与数千年封建经济比，揭示其历史进步性；横，与日本同期的经济改革比，探求其成效不大的根本原因。《略论新儒学与现代性》从评论新儒家们就新儒学与现代性关系问题的有关观点入手，分析了新儒家学家的某些观点的荒谬。认为在现代化进程中，无论是日本、东南亚“四小龙”，还是我国，都要经历一个文化的整合过程，传统文化不可能直接用来为现代化服务，文化的整合过程是传统文化的新生，同时也是一个科学化、民主化和国民性改造的过程。

二是关于胡适研究的5篇论文。我是在研读胡氏家谱时，看到其父铁花先生资料的，他传奇的一生，深深吸引了我。由父及子，我开始研究胡适，而当时这是学术禁区。研讨胡适与徽州文化关系，将他称之为徽州历史上的第三个文化伟人的文章，是为突破禁区后第一次召开的全国性胡适研讨会所写的论文。在近代社会急剧转型的过程中，铁花先生是以传统理学“躬行实践”其爱国情怀的，从东北到海南、台湾，死后而已；胡适则终其一生，实践科学、民主的理念，至死不渝。父子两代也是中国知识分子从传统士大夫到现代知识分子转型的缩影。将胡适与徽州文化脉络联系起来，研究其对商人与社会转型的见解，是胡适研究的新视角。

三是近年撰写的一些书评或序言，择其与社会转型相关者录入。评述之中也记录了我对转型期中国社会的一些见解。其中我为家父评弹艺术家唐耿良先生回忆录《别梦依稀：我的评弹生涯》所写的后记《逝者如斯：我的整理感言》，指出这是一部江南社会文化史，也是一部说书人的生命史，时代、人生、社会交织其间。后记对短时段的事件——“解放”这一社会大转型，给普通人、演艺群体以及传统文化的冲击作了深入的反思。我还组织了一批博士生对评弹与江南社会的关系进行研究，并主编了一套评弹与江南社会研究丛书。作为文化形态的

评弹在社会转型中的变迁,是值得关注的。江南是中西文化冲突、交融,得风气之先的地区,也是近代社会转型领先的地区。江南区域社会研究是国际的显学,近年来优秀成果迭出。我选择了部分评论或书评,其中既有学术大家,也有年轻学子。在江南社会转型的主题下,他们的视野开阔,关注的领域众多。其中有对引领时代潮流先贤的研究。例如在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征程中,张謇是一个伟大的开拓者,是一个公认的英雄。但是,由于中国早期现代化环境的恶劣,以及主体自身的传统文化包袱过重,张謇又不得不扮演一个悲剧性的历史人物。解读《张謇与南通区域早期现代化研究》一书,其主要目的是要解决当代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新问题。正是这种“当代史”的需要,要求张謇早期现代化实践的历史再度发言。也有转型期江南群体的研究,例如商人群体、士绅群体、著姓望族等。还有转型中的江南市镇的研究等。评论还涉及江南研究的资料和研究方法等。

四是学术评述。1998年与2002年我先后主办了中国社会史学会的年会,我在苏州大学时主办的年会主题是“家庭、社区、大众心态变迁国际学术研讨会”,到上海师范大学后主办的主题是“国家、地方、民众的互动与社会变迁国际学术研讨会”。社会史研究是改革开放后才得以恢复的,中国社会史学会在引领史学学术转型的新潮流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历史研究》对这两次会议都发表了长篇述评。

将上述这些读史偶得又久已散落的文字缀辑起来,留下雪泥鸿爪,一直是我的心愿。是为序。

目 录

自序	1
----------	---

中国传统社会转型的思考

试论中国封建社会的剩余劳动——兼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

原因	3
从系统论的角度重新探讨几个史学理论问题	14
论明清资本主义萌芽缓慢发展的原因	30
论徽州海商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49
清季社会经济改革刍议	70
略论新儒学与现代性	89

胡适与中国社会转型

胡适：徽州历史上的第三个文化伟人——试析胡适与徽州文化	97
胡适论商人与社会转型	110
胡适之父铁花先生评传	123
胡铁花年谱述略	140

读史偶得：关于转型期中国社会的若干思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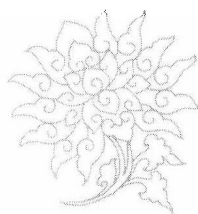
书评与书序

逝者如斯：我的整理感言——《别梦依稀：我的评弹生涯》后记	153
序《晚清以来苏州评弹与苏州社会——以书场为中心的研究》	171
序《技艺与性别——晚清以来江南女弹词研究》	175
早期现代化实践的当代思考——兼评《张謇与南通区域早期 现代化研究》	178
评范金民著《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	190
评白井佐知子的学术思路	196
评吴仁安著《明清时期上海地区的著姓望族》	199
序《江南士绅与江南社会》	204
序《近代上海小报与市民文化研究(1897—1937)》	214
序《江南市镇网络与交往力：以盛泽经济、社会变迁为中心 (1368—1950)》	221
序《中心与边缘：明清以来江南市镇经济社会转型研究——以金山 县市镇为中心的考察》	226
地方记忆与江南社会生活图景——评《上海乡镇旧志丛书》	230
整体史视野下的学术新求索——评《江南场景：社会史的跨 学科对话》	245

学术评述

“家庭·社区·大众心态变迁”国际学术研讨会述评	261
国家、地方、民众的互动与社会变迁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284

中国传统社会转型的思考



试论中国封建社会的剩余劳动

——兼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

人类社会都经历过中世纪的“黑暗年代”。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封建时代显得特别漫长。其原因何在呢？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①中国封建生产方式表现了很大特殊性，它所独有的经济规律制约并规定了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历史进程。

本文以研究中国封建社会的剩余劳动为基本出发点，探求中国封建生产方式所独有的经济规律，以找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根本原因。

一

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里，剥削阶级拼命攫取被剥削阶级的剩余劳动，使各种社会形态区别开来的“只是从直接生产者身上，劳动者身上，榨取这种剩余劳动的形式”^②。在封建社会，农民所创造的剩余劳动（产品）比奴隶所创造的剩余劳动多，这是人们征服自然能力不断

①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2页。

② 《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44页。

读史偶得：关于转型期中国社会的若干思考

增强的必然结果。这就决定了封建社会剩余劳动的榨取形式不同于奴隶社会：对劳动者的人身控制较之奴隶社会放松了；除了地主拥有大量生产资料（主要是土地）和不完全占有生产者（农奴）外，还允许部分农民占有一小块土地。这种榨取形式客观上是与当时人们征服自然的能力相应的。

封建生产方式在世界范围内有其共同之处。就地租形态而言，一般都经历了从劳役地租、产品地租到货币地租这三个相衔接的发展阶段。

在西欧，劳役地租形态发展较为充分；在中国，则产品地租形态发展较为充分。各国的经济条件不同，具体的发展道路也不一样。中国西周时的井田制是建筑在劳役地租的基础上的，农奴虽有自己独立的经济，一般却不可能保留剩余劳动。战国后长达两千多年的漫长岁月中，地主制经济贯彻始终，产品地租成为主要的榨取方式。在产品地租形态上，剩余劳动的分配具有特殊性。马克思曾指出：“在这个地租形式上，体现剩余劳动的产品地租，根本不需要把农民家庭的全部剩余劳动吮吸殆尽。”^①这就是说：地主是可能让农民在交纳地租后不同程度地保留一部分剩余劳动。农民保留一部分剩余劳动（产品）用以补充被消耗的生产资料而进行简单的再生产。而作为封建社会解体形式的货币地租在我国是很不发达的，直至新中国成立前还只是产品地租的补充形式。

研究中国封建社会之所以漫长，探求其独特的发展规律，不能不注意到在产品地租形态上农民有可能保留一部分剩余劳动这一特有的经济现象，并将其作为我们研究的基本出发点。

二

从这个基本点出发，我们着重考察中国地主制经济时期榨取剩余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896页。

劳动的独特经济形式。

产品地租形态上剩余劳动的分配和调整是在地主和农民这两大对立的阶级之间进行的,它包含着两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个方面:农民对剩余劳动(产品)的保留有三种情况。

1. 农民得以保留一部分剩余劳动,这是有利于生产的发展的。
2. 农民的剩余劳动被剥夺殆尽,这时经济的发展就停滞了。
3. 农民不仅得不到剩余劳动,甚至连必要劳动也被侵占一部分。这时,农业生产萎缩,封建经济遭到毁灭性的破坏。这三种情况,一般说来是与每一个统治较久的封建王朝初、中、后三个时期相应的。

第二个方面:地主阶级攫取的剩余劳动有四类用途。

除了农民一方保留的剩余劳动之外,封建王朝和地主阶级这一方又是如何支配被他们剥削来的那部分剩余劳动呢?翦伯赞同志曾将此分析为三类用途:1. 把剥削来的财富的最大部分都用于巩固他们的阶级统治,如豢养大批以剥削农民为职业的官吏和用以镇压农民为任务的军队。2. 土地的再收夺。3. 在奢侈中化为乌有。我们认为上述三类用途总的说是起消极作用,但是也要看到另外一面,如秦始皇、汉武帝、隋炀帝都是“巨大工程的发起者、组织者”。这些组织者还应当包括一些食禄的分子和官吏。他们的俸禄所占用的农民剩余劳动也还有积极因素。同样,封建军队除有镇压农民的反动职能外,还有抵御异族侵扰、保卫边疆、维护统一的作用。安定有利于农业生产,统一有利于经济文化的交流。至于在奢侈中化为乌有的剩余劳动产品当然纯是消极因素了,尽管它会刺激手工业技艺的发展。

此外,我们还必须看到,农民被封建王朝和地主阶级剥夺的剩余劳动还有第四类用途,即用于扩大再生产。封建王朝和地主阶级把农民剩余劳动的大部分作为所得来消费,而把另一部分产品地租和劳役地租积累起来,用于水利的兴修、道路的修筑、荒田的垦辟等等。农民被封建王朝和地主阶级剥夺的这一部分剩余劳动(指用于扩大再生产

读史偶得：关于转型期中国社会的若干思考

的)，客观上部分地转归农民之手，提高了征服自然的能力，促进了社会生产的发展。

地主阶级攫取的剩余劳动在这四类用途中分配的份额是随着每一王朝初、中、后三个时期的演变而不断调整的。

封建社会中，农民保留一部分剩余劳动与地主阶级夺取大部分剩余劳动这两者的关系既是对立的，又是统一的。地主夺得少，农民就保留得多；农民保留得多，又为地主夺得多创造了先决条件。反之，地主夺得多，农民自然保留得少；农民保留得少，又成为农民反抗地主的前因。因此，产品地租形态上剩余劳动的分配和调整是有规律可循的。我们正是以地主制经济形式下农民有可能保有一部分剩余劳动作为一个基本出发点，进而以农民有可能保留一部分剩余劳动→剩余劳动的全部丧失→必要劳动的部分丧失→农民战争（要求对剩余劳动的占有）→新王朝的经济政策的调整→（被迫让农民实际占有部分剩余劳动）的周期性振荡，来表述地主制经济条件下的特殊经济规律的。

为什么剩余劳动要以周期性的形态表现出来？为什么周期性振荡是我国地主制经济的必然规律？根据唯物主义的观点，人们从事生产活动，直接就是为了经济利益；人们进行阶级斗争，最终也是为了经济利益。剩余劳动周期性振荡的必然性正是在当时特定的经济条件下，由封建皇权、地主（豪绅地主和庶族地主）以及农民各自的经济利益决定的。

我们试以封建时代的高峰——唐代为例，加以剖析。

1. 剩余劳动在封建王朝初期的分配

隋末农民战争在政治上沉重打击了地主阶级（特别是拥有大量土地的豪绅地主），局部地调整了生产关系：自耕农的数量增加了，封建的人身依附关系相对松弛了。这就为封建经济的继续发展创造了条件。新王朝建立后，地主阶级对土地的再收夺毕竟还有个过程，而新王朝的政治经济措施则立即决定着农民保留剩余劳动的程度，以及被新王朝